

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态势变化的联系及其成因

陈漓高 赵海波

摘要: 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态势之间具有相互揭示的作用,这种相互揭示的基础是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机制,其前期联系的宏观背景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跨国公司尤其是近年出现的全球生产体系是投资态势和贸易态势后期联系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 东亚地区 贸易态势 投资态势 产业结构转移 全球生产体系

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同为一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核心变量。不难想见,伴随经济的发展,除时间轴上的纵向变动外,各经济体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同一时间段的国际投资态势和对外贸易态势也都有所差别。既然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际投资与对外贸易态势不同,那么,是不是可以推测,在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各国的国际投资态势和对外贸易态势会大致相同呢?换言之,国际投资态势与国际贸易态势与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比较稳定的关系呢?进一步地,一个地区的投资态势和贸易态势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其联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可惜的是,传统上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分开进行的,尽管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缺一不可都无法真正理解对方,但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研究长期存在的“两分”,还是直接造成了对双方的研究的进展依旧很不充分。本文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投资态势与贸易态势之间的对应性和内在联系,实证分析的对象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11个经济体,覆盖的时间约为30年(从1960年代末到21世纪初)。

一、对衡量指标和数据归类方法的说明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首先按照邓宁的投资阶段论,把东亚各经济体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划分在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具体划分标准如下:第一阶段,一国的人均GNP不足400美元;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1000美元之间;第三阶段,人均GNP在1000~2000美元之间;第四阶段,人均GNP在2000~5000美元之间;第五阶

段,人均GNP在5000美元以上;第六阶段,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

在上述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将分别利用东亚各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数据观察东亚各国在每个发展阶段的贸易态势和投资态势变动,然后将在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的投资和贸易态势进行比较,并探究其中的联系及其联系的成因。

(一)国际投资态势分析采用的三个衡量指标

我们对东亚地区国际投资态势的分析将使用三个数字指标: IPI 指数、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和净人均对外间接投资——其中,后两个是绝对数指标, IPI 是相对数指标,是作者首先在此类分析中使用的。我们对 IPI (Investment Position Index) 的定义如下:

$$IPI = \frac{\text{直接投资流出} - \text{直接投资流入}}{\text{直接投资流入}}$$

需要说明的是,使用 IPI 指数并非是要替代衡量国际投资的绝对数指标。在某些情况下,只使用绝对数值会漏掉一些投资态势的重要变化。比如,当一国进入我们定义的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时,国际投资态势趋向内外均衡, IPI 的数值会逐渐降低,并围绕零上下波动,但绝对数指标却可能依然在持续上升——无法反映投资流动的均衡取向。不过,绝对数指标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人均 GNP 刚刚超过 400 美元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绝对数指标往往变化很大,而 IPI 指数则只能在一个较窄的幅度内变动,不如绝对数指标给人的印象强烈。总体而言,绝对数指标更为直观、突出了人口基数的影响, IPI 指数更为抽象,更注重反映投资在流入流出上的平衡,两类指标各有所长,相互补充。

(二) 国际贸易态势的衡量指标及数据归类方法
对东亚各主要经济体贸易态势的分析涉及两套数据(一套出口数据和一套进口数据)。这两套进出口数据是在 SITC_{rev2}分类基础上进行再归类、并经过数步计算之后得出的。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把贸易商品分为 10 类。其中, SITC0 - 4, 主要是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 我们将其归并, 称之为初级产品。SITC5 - 9 为工业制成品。在下文分析中, 我们进一步把 SITC5 和 SITC6 归为一类, 称作标准化工业制成品; 把 SITC7 和 SITC8 归为一类, 称作差异化工业制成品。这样, 基于 SITC_{rev2}的分类, 我们就把一国进出口商品大致分成了初级产品、标准化和差异化工业制成品这样三个类别。具体来说:

第一类, 初级产品 (Primary Products), 包括 SITC0 - 4; 分别为: SITC0 食品和活牲畜; SITC1 饮品和烟草; SITC2 燃料之外的原材料; SITC3 矿务燃料等; SITC4 牲畜、蔬菜及食用油。

第二类, 标准化制成品 (Standardized Manufactures), 包括 SITC5 - 6: SITC5 化工制品 (SITC51 有机化工制品; SITC52 无机化工制品; SITC53 染料、鞣料; SITC54 医药制品; SITC55 油料、香料; SITC56 化肥; SITC57

炸药; SITC58 塑料制品; SITC59 化工原料); SITC6 基本制成品 (SITC61 皮革及皮革制品; SITC62 橡胶制品; SITC63 木材及木材制品; SITC64 纸张纸板及制品; SITC65 棉纱、织物; SITC66 非金属矿产品; SITC67 铁、钢; SITC68 有色金属; SITC69 金属制品)。

第三类, 差异化制成品 (Differentiated Manufactures), 包括 SITC7 - 8: SITC7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71 发电设备; SITC72 特殊用途工业用机械; SITC73 金属加工机械; SITC74 一般机械; SITC75 办公器械和机械; SITC76 电子通讯和音响设备; SITC77 电动机械; SITC78 公路运输设备; SITC79 其他运输设备); SITC8 杂项制成品 (SITC81 卫生洁具、照明设备; SITC82 家具; SITC83 旅游用品; SITC84 服装和饰品; SITC85 鞋类; SITC86 科学和控制仪器; SITC87 精密仪器; SITC88 摄像和感光器材; SITC89 杂项制成品)。

二、东亚地区投资与贸易态势的对应及其联系

(一) 国际投资态势与国际贸易态势的相互对应
在总结东亚地区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态势变动的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两者在本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对应情况 (表 1)。

表 1 东亚地区总体国际投资态势与对外贸易态势的对应情况

项目 \ 阶段		400 美元以下	400 ~ 1 000 美元	1 000 ~ 2 000 美元	2000 ~ 5000 美元	5 000 ~ 10 000 美元	10 000 美元以上	
投资态势	IPI (%)	- 0.92	- 0.94	- 0.66	17.67	2.87	12.74	
	人均直接投资 (美元)	- 2.75	- 12.07	- 42.69	- 75.93	- 130.20	- 54.448	
	人均间接投资 (美元)	- 1.31	- 2.72	- 7.56	- 4.72	- 17.58	49.74	
贸易态势	出口 (%)	初级	63.1	41.4	26.7	15.5	11.5	7.0
		标准化	15.1	22.1	20.6	23.5	24.1	21.0
		差异化	19.0	34.7	44.2	59.4	63.3	70.3
	进口 (%)	初级	28.4	37.9	36.9	43.3	40.0	25.8
		标准化	31.1	27.1	25.8	22.0	24.2	22.6
		差异化	36.1	30.5	33.6	34.2	36.5	49.0

注: 表中数据包含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 11 个经济体, 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联合国历年《贸易统计年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年鉴》计算得出。

在第一阶段, 一国的对外贸易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 标准化工业制成品和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加起来也不及初级产品。进口结构中, 标准化制成品和差异化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都大于初级产品。同时, 在此阶段, 该国接受的国际投资 (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 都很少, 而且基本上没有对外投资, 完全是国际投资的净接受者。

由表 1 可以看到, 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 标准化制成品和差异化制成品的出口开始上升 (上升的速度较快, 而且

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合计要超过初级产品出口)。进口在这一时期的变动幅度较大, 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进口增加。国际投资态势在这一阶段发生明显变化。对国际投资依然以接受为主, 数量相对于第一阶段, 大幅上升; 间接投资的接受数量依然相当有限。

在第三阶段, 出口态势中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比重急速下降, 差异化制成品的出口迅速增加。标准化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没有继续上升, 而是出现小幅的回落。这一阶段三类产品进口的变动幅度都不是很大, 初级产品进口稍有下降, 标准化工

业制成品的进口继续小幅下降,差异化制成品进口有所增长。这一阶段,人均接受的净投资水平继续提高,而且幅度加大,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一阶段的人均净直接对外投资快速上升。投资态势变换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IPI 的数值上升,这表明对外投资已经出现明显的增长迹象。

在第四阶段,出口态势发生质的变化:初级产品在出口中不再重要,标准化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略有上升,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接近 60%。在本阶段,三类产品在进口中的比例再次拉开差距:初级产品进口上升,并且在进口中居于主导;标准化工业制成品进口延续小幅下降的趋势,差异化制成品进口稍有增长。国际投资态势在这一阶段也发生质变,一举由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接受者转变为净供给者。

在人均 GNP 在 5 000 ~ 10 000 美元之间时,出口中初级产品的比重继续下降,在本研究所覆盖的地区,标准化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稍有提高,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在进口方面,初级产品进口转升为降,但依然在进口中居主导;标准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转降为升,但变化幅度不大,

差异化制成品进口继续小幅增长。这一阶段国际投资的净供给出现下调倾向,IPI 指数下降,未加权的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继续增加。

贸易态势和投资态势在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变得更为确定。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在整体出口中变得不再重要,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初级产品完全失去在进口中的主导地位,标准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再次下降,差异化制成品进口迅速增长,并与其在出口中地位一样,成为整体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在国际投资态势变化中,净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再次加快,IPI 指数上升,在国际间接投资上,由净接受者的状态一举转变成成为净供给者。

(二) 贸易态势和投资态势在相互对应基础上的相互揭示

贸易态势和投资态势的对应可能使得二者具备一定的内在联系性,尽管尚不能保证这种联系自始至终的一致性,但通过东亚地区的实证材料我们发现,一国贸易态势的变动和投资态势变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表 2 就是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亚各经济体贸易和投资态势的大致勾勒。

表 2 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投资及贸易态势的关系

	经济发展阶段	资本和投资态势	贸易态势
日本	高	资本剩余大 直接和间接投资的提供者	差异化产品交互贸易和标准化产品进口为主 初级产品进口
四小龙	中高	资本剩余 对外投资同时接受投资	差异化产品交互贸易 标准化产品出口 初级产品进口
东盟和中国	低	资本相对短缺 以接受投资为主	差异化产品贸易 标准化产品 初级产品出口

以东盟为例,其出口态势的典型变化是初级产品比重的迅速下降和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快速提升——对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地区而言,其出口态势已与处于经济发达阶段的日本和四小龙相仿。贸易形态的这种快速转变和东盟国家大量接受国际直接投资有关,其国际直接投资态势上处于净接受者状态(IPI 指数一直接近 - 1)。并且,在国际直接投资态势揭示出口结构的过早转变的同时,进口结构又反应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态势——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影响了这些经济体的出口,而且影响这些经济体的进口——这一点从其与日、韩的进口态势的差异中就可以反映出来。

尽管重视程度不同,但东亚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都利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力量。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东亚地区总体国际直接投资态势从净接受者向净供给者的转变发生在人均 GNP 处

于 2 000 ~ 5 000 美元的时期。此时,出口中初级产品在出口中地位真正变得不再重要,从研究所覆盖的情况看,这一比重只占总出口的 15%。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接近 60%。

日本的投资态势变动也可与其贸易态势的变动相互补充说明。因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态度与其他经济体有别,流入的国际直接投资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大。日本长期推行贸易立国战略,其对外贸易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初级产品的进口和差异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某些时间段,两种态势间补充说明的作用体现得非常清晰。比如在进入 80 年代,日本的出口贸易结构出现重大转变,这与其在 1985 年日元被迫升值后大规模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并把部分产业和工厂迁移到海外直接有关。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投资态势会影响到一个国家贸易态势。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间接投资

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贸易态势也会反映这种联系。也就是说,贸易态势和投资态势之间可以相互补充说明——当然,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说明对方的情况。比如贸易态势的变动不仅受到国际投资的影响,而且受到相关政策尤其是国内资源禀赋等的影响。我们提出的两种态势之间相互揭示只是部分的,并不完全。

三、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 态势的联系背景与途径

我们知道,尽管传统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研究之间存在严重的“两分”,但没有人否认贸易和投资之间复杂而又重要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国际投资态势和国际贸易态势之间存在对应并可相互揭示的基础。

应强调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已使贸易和投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赵海波,2006)。在此前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企业国际化一般要通过按部就班的线性次序完成。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讨论也大体是按照“替代-互补”的思路展开的。然而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开始形成,传统研究思路的意义和重要性由此都被大大削弱。此时传统上那些会引致投资或贸易的因素(如贸易壁垒、投资障碍等)的重要性大为降低,不同区位要素成本的差别、基础设施的质量、当地的市场环境等因素变得愈加突出而重要。

(一) 传统国际环境中贸易态势和投资态势联系的宏观背景

在传统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转移是揭示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态势联系的宏观背景。国际贸易态势的变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指示器。出口商品结构的变换直接是国内产业结构向海外的延伸,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则是出口商品结构演变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东亚经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调整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贸易态势中的进口和出口结构变化只有在此背景下方可得到恰当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产业格局曾先后出现过4次较大规模的调整,在本研究所覆盖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已发生过两次。美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两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角(日本在后期作用增强)。调整之后,美国和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汽车以及电子、航天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同时通过对外投资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1973-1975年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西方工业国家能耗较大的重化工业受到沉重打击,产业结构在国际范围内第三次出现大规模的调整。发达国家开始集中力量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部分粗放型重化工业向海外调整。此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逐步丧失,加之发达国家对轻纺工业产品采取限制性进口政策,“四小龙”开始被迫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大力承接并引进美国和日本转移过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造船等);另一方面开始把已失去比较优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到以东盟为主的国家,以此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此次调整使得“四小龙”的重化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香港除外),并迅速实现工业化,重化工业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相应增加。韩国和东盟的马来西亚此时处于同一收入水平,80年代韩国却一举超过马来西亚。东盟国家积极参与了这次产业结构调整,马来西亚和泰国率先把面向国内市场的轻纺工业转向出口,接着,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开始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调整之后,这几个东盟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均得到了长足发展。

第四次产业结构调整开始于80年代。1985年西方五国财长会议后,美元再次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石油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使得日本和整个东亚地区都受到强烈冲击。作为东亚地区产业调整的源头,日本开始大力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展开竞争,同时进一步把在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向海外,尤其转移向“四小龙”和东盟,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进行生产,然后向日本国内市场返销,并向其他地区出口。以日本和美国为主导的这次产业转移,除了包含附加值较高的部分轻纺工业外,还包括汽车、电子等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此次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对外投资的展开对“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的影响要大大超过前述几次。

受到强力波及的“四小龙”再次抓住机遇,进一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随着发达国家主要针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保护措施加强,“四小龙”均提出了新的产业升级目标。韩国提出“科技立国”,中国台湾强调“科技升级”,新加坡提出实行“第二次工业

革命”,中国香港则标榜“工业多元化”。由此,它们一方面承接、吸纳美国和日本转移过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再次升级;另一方面进一步把自身已失去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投资向东盟外和随之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大陆和越南转移——此时的“四小龙”已经成为净对外投资地区。

东盟国家在70年代初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不过,在80年代中期前,东盟四国以农矿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变。80年代早期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教训,他们开始相继推行“第二次进口替代”,并利用第四次国际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机会,在不放弃利用本国资源优势发展重化工业的同时,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此间尤以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发展更为突出。

(二) 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投资态势与贸易态势联系的微观基础

跨国公司是国际投资载体,是投资态势影响贸易态势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贸易和投资障碍被大大消除,货物和资本跨国流动的成本大幅降低,这和流程化与标准化了的贸易和资金流动的便利措施等因素一起,促进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

全球生产体系的安排有三个核心要素:公司治理、全球价值链和地理空间上的布局。我们这里主要利用前两个要素进行分析,以找出它们影响国际贸易的具体途径。

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全球生产体系的安排中最为核心的一个要素。国际生产体系的治理结构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有直接进行生产监督的股权联系形式,也有各种非股权联系方式(如出卖产销权、合

同分包、专利使用特许等)。不同类型的企业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比如 Intel 创建的全球生产体系就是通过股权联系完成的;而 Limited Brands 是通过非股权方式连接;Toyota 则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在某些部分实行股权性质的联系,在另外一些技术标准部分则采用非股权方式。

全球生产体系的另一要素是组织安排公司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包括从技术研发到生产及售后服务的整个过程,而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可能只是集中于这个价值链的某个部分。从理论上,跨国公司增值链条的任一环节均可结合当地的环境被安排在其全球生产体系的任何一处——甚至公司的研发也可以在国外的子公司进行。

总体而言,国际生产体系可以被细分为不同的功能和活动,跨国公司集中优势于某一阶段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比如 Intel 的核心战略是取得市场支配权,方法是创新设计以使产品差异化,最终促成其产品成为“技术驱动型”的国际生产体系。Toyota 的核心竞争力则在于不断提高汽车的品质和生产效率,因此,其国际生产就是“生产驱动型”的。另外,在许多部门(如成衣产业),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品牌和不断及时满足消费者口味和偏好变化的能力,这样的产业的国际生产体系就是“市场驱动型”的。

由表3可以看出,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的多方向联系已非常复杂,真正的公司内的国际分工也越来越明显。一个重要后果也由此产生,即公司内贸易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这也正是国际一体化生产(即全球生产体系)的核心特征。按照全球价值链的安排,公司内部贸易的主体无疑为资本品贸易。表3给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态势与国际生产体系间的内在联系。

表3 国际生产体系、公司治理结构、与贸易和投资态势

跨国公司的治理功能集中于	内部化 (股权基础上的控制)	混和 (股权以及非股权基础上的控制)	外部化 (非股权基础上的控制)
技术驱动型	投资伴随贸易或者单向差异化产品贸易	贸易	-
生产驱动型	-	投资伴随贸易	-
市场驱动型	-	-	投资伴随贸易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资本品进口比重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比较复杂的。资本品的适当进口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无论在“四小龙”还是在东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品进口的作用都不容忽视。比如,中国香港纺织业的增长就是在子公司不断进口新的机器设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台湾一些公司也通过向发达国家的跨

国公司购买设备来维持合成纤维和电子产业的生产,东盟国家的电子产业更是如此。但资本货物进口过多也往往说明跨国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关联程度较低,并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经济。总之,资本品进口的作用虽不可低估,其进口可大大缓解生产供应的紧张,同时扩大了东道国内这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不过,不应过分强调这类产品的进口数量问题。

四、总结

本文是对东亚最为重要的 11 个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态势间的关系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国际投资态势随一国的经济发展会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变化趋势。相应地,一国的对外贸易态势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动,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会逐步降低,在进口中的比重会逐步提高,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中的比重同步地提高等。

在上述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了东亚地区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态势间的比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发现,两者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揭示的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态势间的这种相互揭示,其理论基础是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机制,宏观背景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跨国公司及其全球生产体系是两者之间联系的微观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尚不能高估跨国公司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影响。首先,相当部分的贸易实际上和投资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即使在经济一体化趋势发展迅猛的今天,单单贸易本身也依然是连接各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一条古老而又坚韧的纽带。此外,与跨国公司相关的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当前尚很难给出一个准确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还不能赋予它对贸易全部的影响和解释力。

最后,尽管本文处理的问题属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范畴,也试图给出看待东亚地区投资态势与贸易态势变动的新角度,但本文不是也不可能澄清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本文只是在对东亚地区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给出了一些结论。因此,不是很准确地说,本文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提供了诸多活生生的事实,它引起思考的问题多于它给出的结论。

注释:

邓宁首先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对外投资态势密切相关。他把一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分成四个阶段,并用以考察经济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其后,邓宁本人及其他学者对该理论又进行补充和修正。邓宁的学生 Rajneesh Narula(1996)在四阶段论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的第五阶段,将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下我们把上述理论统称为邓宁的投资阶段论。

在定义这类指数时,分母既可以使用直接投资流入,也可以采用直接投资流出,或者用流入与流出的总量。IPI 的分母采用的是直接投资流入——这种做法其实是最便利

的,原因是:如果用直接投资的流出作为分母,那么在一国不存在直接投资流出的时期,这一指标都将一直不存在,而这个阶段在我们分析的地区恰恰是时间段中最长的。

下面一位数和两位数的分类名称是按照 SITC_{rev2}给出的(之所以没有按照 SITC_{rev3}给出商品分类的名称是因为,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时期,贸易资料基本上都是按照 SITC_{rev2}进行统计的)。

这种分类离完全反映事实还存在差距。David Richardson 等(1999)曾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分析美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在该文中,作者也认为此种划分方法只是一种粗浅分类。此外,在一些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克鲁格曼等都曾经使用过中间产品和差异化产品这样的用词,但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这个数字里面也包含了东盟组别中马来西亚的数据。

如果在 SITC 分类基础上归总,一般把 SITC7 机器和运输设备作为资本货物的进出口看待,但要除去 7194 非电类家用机器、7241 电视接收机、7242 无线电接收机、7250 家用电器、7321 客车、7326 客车底盘、7329 摩托车和 7331 自行车。此种分类方法曾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处采用。

在美国,本国与外国跨国公司总共占其 1996 年全部出口的 3/4,其中 1/3 以上是公司内部贸易,然而,美国的数字很难直接推算世界总体的水平;另外一项估计表明,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占世界出口的 1/5 以上,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 1/3(《世界投资报告》,258 页,1999)。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2. 赵海波:《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的评析》,载《云南社会科学》,2006(3)。
3. Gh, Ai - Ting and Olivier, Jacques, 2002. "Learning by Doing, Trade in Capital Goods and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6, pp. 411 - 444.
4. Dunning, J. H., 1994. "Re - evaluating the Benefi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3(1), pp. 23 - 51.
5. Lee Jong - Wha, 1995. "Capital Goods Imports and Long - run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8, pp. 91 - 110.
6. Richardson, J. David and Zhang, Chi, 1999. "Reveal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Chaotic or Coherent Patterns Across Time and U. S. Trading Partner." *NBRR Working Paper*, No. 7212 (<http://www.nber.org/papers/w7212>).
7. Narula, Rajneesh, 1996.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Structure*. London: Routledge.
8.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2/1996/1999/2002.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天津大学社会科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2)
(责任编辑: L)